

天命：当中国领导世界

The Mandate of Heaven: When China Leads the World

“那些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

——尼采《偶像的黄昏》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引言：历史的钟摆

当今世界最宏大的叙事，莫过于中国的归来。这不仅是经济版图的重绘，更是人类历史钟摆的一次剧烈回摆。

面对这一变局，西方主流学界习惯于将其解读为对现有霸权的威胁，或是某种异质文明的回归。然而，这些解释都过于浅表。它们仅仅看到了力量的消长，却忽视了更深层的逻辑：**这不仅是谁来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用什么逻辑来领导世界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就会发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并非始于当下，而是源于文明最初的生存设定：

面对一片如此富庶而又潜藏危险的辽阔大地，中华民族该如何生存？

一、文明的原点：律法之山与建设之山

在人类文明的源头，矗立着两座隐喻性的山峰，它们分别定义了西方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生存逻辑与治理基因。

一座是**西奈山**。先知摩西在雷电中独自登山，面对神意。他带下山的不是面包，不是工具，而是两块刻着十诫的石板。面对旷野中混乱的以色列各支派，摩西确立秩序的方式是“**律法**”——确立人与神的契约，并由此衍生人与人的契约。这一刻，隐喻了西方文明“保守”的生存逻辑：**秩序来自天降律法，完美的秩序在于保守一套永恒的规则。**它关注权利的界定，预设了神恩之下的温室花园，其核心任务是通过政治论辩、法律博弈来切分蛋糕。在现代西方，这种逻辑最终演化为“律师治国”的迷之自信。

另一座是**涂山**。大禹在此会盟诸侯，但他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泥泞中跋涉了十三年。面对滔天的洪水，大禹没有逃去旷野等待天上掉下来的吗哪和鹤鹑，而是拿起了耒耜和准绳。他确立秩序的方式是“**建设**”——疏通河道，削平山川，将肆虐的洪水纳入江河，从而划定九州。这一刻，隐喻了中国文明“变革”的生存逻辑：**秩序来自建设实践，有效的秩序在于驯服不断变化的环境。**它关注问题的解决，预设了洪水肆虐的生存试炼，其核心任务是如何通过改造自然、重塑山河来做大蛋糕。在当代中国，这种逻辑最终体现为“工程师治国”的建设奇迹。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西方兴起使得“保守逻辑”——致力于维护既定的权利边界——主导了全世界的观念；而今天，中国崛起正在向全世界展示“变革逻辑”——致力于在实践中自我革新——的力量。

二、 美国神学：拿“运气”当“能力”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叙事，长期由一种源于自由主义右翼的话语体系所主导。其核心论调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终结”：西方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美国神学”。

这套神学是“天降律法”的现代回响：繁荣是上帝对“坚守信仰”的奖赏，“因信称义”，只要照搬英美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这套神圣律法，繁荣就会自动降临。它把一种基于特定时空条件的成功，神化为普世的真理。

不幸的是，这套神学犯了一个根本性的归因错误：它将自然的馈赠（运气），描绘为制度的胜利（能力），使自身成为一种廉价的成功学。

傲慢之罪使它敢于宣称真理在握，敢于用单一的价值尺度——即西方的制度——来衡量复杂的历史进程。在美国神学笼罩下的中国现代化叙事中，数千年中国历史被简化为“专制、停滞”的黑暗历程，仿佛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文明的辉煌，人民从未创造过值得骄傲的成就。更为吊诡的是，这种叙事愿意为中国历史开出了一扇狭窄的天窗，选择性地肯定后四十年，将其描绘为向西方制度靠拢的必然结果。却不愿意，也不能够讲述一个完整的、连贯的中国故事。

这不仅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误导了广大南方国家。唯有超越这种神学，看清“温室花园”与“生存试炼”的区别，我们才能读懂“中国道路”的真意——这绝非温室花园里的顺水推舟，而是一部中华民族在生存试炼中逆天改命的英雄史诗。对于每一个没有‘天降好运’的南方国家而言，这更是一份打破宿命的启示录。”

三、 历史的底色：人与自然的博弈

让我们回到最底层的视角。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类战胜自然、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故事。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禀赋，设定了不同的生存难度，也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

中国文明，是一个以“大禹治水”为源头和象征的伟大叙事。这片土地并不贫瘠匮乏，相反，它拥有北半球最广阔的温带沃土和最丰富的水热资源，凭借这份天赋的丰饶，中国在漫长的农业时代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承载了全球最多的人口，其经济总量曾在两千年中长期居于世界之巅。然而，这种优越的天赋伴随着危险的试炼——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在世界文明史上，很少有哪个文明像中国这样，不得不将人与自然的斗争提升到如此核心的位置。黄河、淮河的治理，都江堰、郑国渠的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这些工程奇迹背后，是一个民族与水旱灾害进行的持续搏斗，是农业文明在东亚大陆上的极限适应。

这种搏斗塑造了中国文明“**实事求是**”的基因：面对无情的自然法则，任何空谈和教条都无济于事，唯有通过大规模的组织和动员，才能在洪荒中求得生存。在这里，生存不是理所当然的权利，而是战胜危机的结果。

然而，巨大的自然风险和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虽然在农业时代激发了中国人改造世界的潜能，却也形成了一道高墙，挡住了它走向工业化的道路。

因此，当工业革命降临，农业文明的辉煌转眼间变得脆弱不堪。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本质上是一个看天吃饭的农业国，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工业国时的必然溃败。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停滞”或“落后”的指责，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问题不在于这个文明本身有什么根本性的文化缺陷，而在于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四、 市场物理学：工业化背后的农业稳态

工业化不会凭空发生，它需要严苛的经济社会条件。对于除了英美等极少数“幸运儿”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这些条件并非天然具备。其中最关键的，是**“有效市场”**的形成。

然而，“有效市场”不是只要挂起“市场经济”的招牌就会出现。它的前提是**极低的市场风险**。经济学家们常常抽象地谈论“市场风险”，但很少追问：风险从何而来？答案就是：**粮食和能源**。

作为经济链条最上游的基石，粮食和能源的供应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市场的稳定性。

我们谈论的不仅是物资短缺，更是价格的剧烈波动。乾隆皇帝有一句话：“天下无不食米之人，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莫不准此递加。”意思是说，米价是百价之基，一旦米价上涨，所有商品和人工的价格都会跟着涨。这揭示了一个被现代经济学忽略的传导机制：

当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时，整个价格体系就会崩塌。丰年谷贱伤农，灾年米贵饿殍。这种波动会经由价格信号快速传导至全社会：企业无法预期成本与收益，就不敢扩大再生产；劳动者无法预期工资购买力，就不敢脱离土地成为产业工人；资本为了避险，就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投入长周期的技术研发、产业投资。

更深层的致命伤在于资产难以稳定估价。在生存预期极不稳定的社会里，土地和资产缺乏一个保值的底线。丰年时大家争相买地，地价虚高；灾年时为了换一口救命粮，千金良田也会被贱卖。这种价格震荡使得资产交易变成了赌博，买卖双方都无法看清未来的价值，生意很难谈，即便谈成了也往往有悔约纠纷，使得交易过程和条款变得极为复杂，交易费用高昂。

归根结底，只有当最基础的粮食和能源价格稳定了，市场上的万物才能被确切定价。只有当价格信号不再透露着生存恐慌，交易成本才能降低，分工才能深化，“有效市场”才能真正形成并支撑起现代工业体系。

五、 温室花园：低风险天赋与西方的兴起

究其根源，工业革命为西方兴起提供了压倒性的物质力量。孕育了这场工业革命的英格兰是“有效市场”自发形成的特例，但这不是某种抽象文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幸运之子”的际遇：一种基于特殊地理禀赋、不可普遍复制的历史经验。

1. 自然彩票：运气爆棚的温室花园

英格兰拥有温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受北大西洋暖流和西风带影响，降水全年分布均匀，没有明显的旱涝季节变化，极端天气极少。与中国没有定数的季风气候形成鲜明对比，英格兰的农民不必担心“今年丰收明年绝收”的剧烈波动，粮食产出可以准确地预估。

“有恒产者有恒心”。正是这种高度确定性（低风险），使得英格兰走上了一条与欧亚大陆不同的道路。在这里，人们关心的只是划好地界，写好租约。地里总能长出粮食，一分耕耘必有一份收获，并不需要为之忧虑。

2. 定额地租：幸运的奢侈品

在粮食产出忽高忽低、如同赌博般难以预料的欧亚大陆，如果采用定额地租，地租收低了地主喝西北风，收高了农民“久赌必输”。因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分成地租**——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才是唯一可能的普遍制度。

而英格兰不同。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都相当稳定，地主和农民才可以用最简单易行的“一口价”“五十年不变”来说定粮食分配的规矩——这就是**长期定额地租制**的由来。根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考证，自中世纪甚或更早时期，“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就已在英国普及。这并非英国人比其他人更有“契约精神”，而是**稳定的粮食生产赋予了他们采用这种制度的“奢侈”权利**。

“信心比黄金更宝贵”，长期定额地租制不仅仅是让农民和地主双方省心省力，更对整个社会的运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3. 经营方式演化：租地农场的兴起

在长期定额地租制的基础上，英国农业演化出了**租地农场**这种经营方式。租地农场主作为经营者，一方面向大地产拥有者租入土地、支付定额地租，另一方面从小农中雇佣农工、支付定额工资，土地产出由他独立出售，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剩余成为他独立所有的盈利。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正是**现代企业的先驱**——它与现代企业“定额利息支付给银行、定额工资支付给工人、独享剩余利润”的模式完全同构。

作为现代企业的先声，租地农场和现代企业一样有盈有亏，不是每一个都能活下去。幸好，得益于英国高确定性的粮食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高确定性的物价和工资水平，这种扩大式的生产经营是有机会持续的，社会上总有它的生存空间，于是租地农场逐渐发展起来。

4. 社会秩序：斯密财富三要素的统一根源

粮食产出的确定性还带来了更深远的社会后果。在 1755 年的一篇演讲中，亚当·斯密提出了财富增长的三个要素：“除了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过得去的司法（*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之外，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一直以来，这三个要素被认为是各自独立的“制度配方”。但从英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它们其实只是同一个根源——**低风险环境**——在不同侧面的投影：

和平：不单指无战争，更指社会内部的低冲突。正是粮食产出的确定性降低了人们的生存焦虑——基于长期的生活经验，人们确信只要当下尚能糊口，未来也大概率还能糊口。这种对未来生存的确定预期消弭了剧烈的生存博弈，造就了和平秩序。

- **便利的税收：**和平秩序下，政府没有迫切的税收需求去维持武力，人民也有稳定的收入来纳税。另外，当产出可预期、物价波动小时，税收就变得很容易计算和征收。这就减少了围绕“滥税”与“抗税”的缠斗，进一步巩固了和平与繁荣。
- **过得去的司法：**这一点最常被误读。英国之所以实行看似松散、甚至有些“糊涂”的普通法体系，是因为它的社会冲突烈度低，司法任务本来就不重。正如温暖的夏威夷不需要厚重的冬衣，一个大家都有余粮的社会也不需要精密高效的司法。相比之下，欧亚大陆上的生存环境更为严酷，社会冲突频繁，政府必须建立强力的管制体系来维持秩序，否则社会就会解体。与其说英国拥有“优越的法治”，不如说它拥有“不需要强力法治”的幸运。

斯密所描述的理想国，并不是普世的制度设计，而是低风险环境下的自然状况。

5. 综合效果：有效市场的水到渠成

在工业革命之前，英格兰还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农业革命。17-18 世纪，四轮作制（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的推广消除了休耕、提高了产量，畜牧改良使牲畜与种植有机结合、改

善了土壤肥力，圈地运动则进一步确立了竞争性的租佃关系，为规模化经营扫清了制度障碍。这场技术与制度的双重革命，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和稳定性，释放了大量劳动力。

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作为岛国，英格兰任何地方距海不超过 120 公里，海岸线曲折，伦敦、利物浦、布里斯托尔等天然良港众多，运河建设又将工业区与港口连为一体，运输成本极低。煤炭储量丰富且约克郡、兰开夏、纽卡斯尔等煤矿靠近港口和主要工业区，为蒸汽机的发明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业稳定、能源充足、交通便利——这些条件叠加，使得粮食价格平稳，市场风险极低，产权价格容易确定，交易费用较低，劳动力可以安全离开土地，资本敢于长期投资，“有效市场”水到渠成地形成了。

6. 英格兰的镜像：美国北方

美国北方的条件与母国英格兰同样优越。

新英格兰和纽约、宾夕法尼亚等中部殖民地属于温带湿润气候，受大西洋影响，降水稳定均匀，没有季风气候的剧烈波动。宾夕法尼亚土地肥沃，被称为“美国的面包篮”，小麦产量丰富，粮食价格稳定，农民收入可预期。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等优良港口星罗棋布，哈德逊河、特拉华河等内河可通航，1825 年伊利运河开通后更将大西洋与五大湖连为一体，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新英格兰虽然缺乏煤炭，但河流众多、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马萨诸塞州洛厄尔成为著名的水力纺织工业中心；而距离不远的宾夕法尼亚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通过运河可便捷运往沿海各州，为从水力向蒸汽动力的转型提供了能源基础。

农业稳定、能源兼备、水运便利——美国北方几乎完美复制了英格兰的工业化条件，“有效市场”自发形成，工业化自然展开。

7. 西方优越论：温室花朵的傲慢

英美崛起中蕴含着巨大“运气”成分，但是，后世的理论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宣称只要模仿西方制度，搞搞多党选举、私有化、市场化，繁荣就会自动降临。这种观点否认了世界的复杂性，把这种基于特定时空条件的西方发展模式普世化，无异于一种廉价成功学——它无视了环境的馈赠，傲慢地将运气包装成了能力。

六、 殖民掠夺：助力而非动力

关于西方的兴起，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误读：右翼的“美国神学”将其归结为西方制度的胜利，把运气包装成了能力；而左翼的“依附理论”则将其归结为殖民掠夺的后果，把罪恶夸大成了动力。

这种理论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为通过殖民掠夺积累了原始资本，从而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理论虽然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罪恶，但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颠倒了因果。

历史事实证明：掠夺不是现代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原因。

1. 西班牙：黄金漏斗的教训

最有力的反例是西班牙。它是最早的“日不落”殖民帝国，从 1492 年开始持续 300 年，从美洲掠夺了数量惊人的金银。按照“掠夺富强论”，西班牙理应成为最强大的现代工业国。但结果恰恰相反：西班牙成为了著名的“黄金漏斗”。

为什么？因为西班牙本土受地中海气候制约，农业产出很不稳定，无法为工商业提供稳定的粮食剩余和市场需求，导致本土工商业非常脆弱。因此，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并没有在国内转化为资本投入再生产，而是被用于购买外国商品、维持庞大军队和奢侈消费。

这些黄金如流水般流过西班牙，迅速流向了荷兰、英国和法国——那些拥有稳定农业和繁荣工商业的国家。最终，坐拥金山的西班牙不仅没能工业化，反而因严重的通货膨胀快速衰落为二流国家。

2. 英国：财富增殖的“钞能力”

相反，英国早期掠夺较少，但凭借本土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发展出了繁荣的工商业体系（纺织、造船、金融）。

当英国后来开始向外掠夺时，抢来的每一分钱都能投进本土的产业循环中：投资工厂、改良技术、扩大贸易。这种财富增殖的“钞能力”才是关键。英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霸主，是因为它具备了消化和利用财富的“肠胃”，而不仅仅是拥有了抢夺财富的“爪牙”。

3. 工业化：动力在内不在外

西方的兴起，殖民掠夺无疑是巨大的“助力”，但绝非“动力”。

真正的“动力”源于本土农业稳定带来的工商业优势。西北欧稳定的降雨和低风险环境，孕

育了有效市场和深度分工，这才是西方力量的源泉。有了这个内核，才有了后来在军事和商业上掠夺全球的能力。

刻意将西方兴起简化为掠夺的结果，虽然在道德上占据了高地，却在逻辑上陷入了误区。这种“归因于外”的思维掩盖了工业文明真正的门槛。

至此，我们可以对西方模式做一个彻底的澄清：事实证明，无论是右翼吹捧的“制度神学”，还是左翼执着的“依附理论”，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西方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一个不可复制的前提之上——天赋的低风险环境。

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荒野上的烈日严霜。广大南方国家和中国一样身处“生存试炼”，缺少天赋的低风险环境，盲目复制西方制度这样的“温室花朵”，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中国走出了新路。

七、 生存试炼：高风险挑战与低水平均衡

中国文明面对的，不止是得天独厚的富庶，更是季风气候带来的试炼。尽管这片土地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季风气候带来的旱涝不定，山地丘陵占据的大部分国土，人均耕地的严重不足，近代以来化石能源的相对贫乏——这些都是摆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在这里，划好的地界，写好的租约，都抵挡不住来自洪水与干旱的致命一击。

1. 无法深化的分工

我们可以从一首相传为描述河东盐池的上古歌谣说起：

- >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 >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这首《南风歌》相传为舜所作。它道出了季风既带来富庶，又带来危险的真相：“南风”带来充沛的降雨和高热，是农业、盐业丰收的最佳条件，这使得东亚大陆拥有了令人惊叹的高产和财富，然而，这种得天独厚的背后又潜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南风之不时”——季风一旦失约，则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灾难。从三皇五帝到新中国建立这五千年来，从农业到工商业，先民的所有生产都长久地处在这种丰饶与风险共生的环境之下，发展受阻，这一局面从未根本性改观。

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通过价格波动创造了一个双重困境。让我们以河东盐池周围的居民为例来理解这一困境。河东盐池位于山西运城盆地，盐池周围土地盐分较多，不适合耕种。假如盐池周围的晒盐人专职晒盐，去和良田上专职耕作的人交换粮食，那么双方都能得到分工交换的好处。但现实中，这种分工却难以自发形成。

季风是不稳定的，“南风之时”没有定数。平年时，晒盐收入可以买到足够粮食；但是灾年时，种粮的人自己也需要活命，只能减少粮食出售，于是粮价暴涨，晒盐的人会发现自己买不起粮了；同时，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购买力都被迫转移去抢购救命粮，导致对手工业产品需求的下降，晒盐的人还会发现自己卖不出盐了。这样一涨一跌的价格剪刀差会使他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危险，因此必须自己种一些粮食作为保底。

历史上，由于盐是重要税源，政府往往设立专门的盐户，强制他们专职晒盐。但这种由官府维持的专业化同样是脆弱的——一旦粮价暴涨，盐户或依赖官府救济，或逃亡求生，史载多有盐户生计艰难、纷纷逃散的记录。

同样是因为粮食能否产出不稳定，专职种地的人也很难获得稳定的收入——丰年时粮食多但价格低，卖不出好价；灾年时价格高但是粮食少，也卖不出多少钱甚至没得卖。所以种地之外他还必须兼做手工，才能购买其他用品或者是补充粮食。

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一切行业，不仅做工的人不敢专职做工，种地的人也不敢专职种地。

这种双重困境就导致了黄宗智所描述的清末江南和华北的“内卷化”现象：农民既种地又兼做手工，家庭所有成员都要劳动，劳动时间很长，劳动强度很大，极度勤劳却极端贫困。《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讲到德国的类似情形：“土地的分散通常总是要分到土地小得不能养活一家人为止……土地不让这些人去另谋生计，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级也是极端贫困的。”这种现象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欧亚大陆凡是粮食生产不稳定的地方都能看到。

2. 为什么规模化、机械化经营无法建立？

“内卷化”的本质，不是人口过剩，而是分工水平的停滞。由于无法建立规模化的工场手工业，更无法过渡到机械化生产，巨大的劳动力只能被紧紧吸附在小块土地的耕作和家庭副业的低效循环中。

以传统棉布业为例，虽然鸦片战争前其总产量高达 3.1 亿匹，看似规模宏大，但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产业规模，而是无数个家庭作坊的简单叠加。绝大部分棉布都是农民自产自销或就地交换，极少进入远程贸易网络。为什么在这个最大的非农行业里，迟迟没有诞生大规模的织布工场？

根本原因在于高风险环境扼杀了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的可能。

首先，市场需求极不稳定。在看天吃饭的农业社会，消费者的购买力完全取决于粮食的收成。丰年尚能消费，灾年连饭都吃不饱，对布匹的需求会急速下跌。这种剧烈的需求震荡，使得任何试图扩大产能的工场主都注定要面临产品积压、资金链断裂的灭顶之灾。

其次，资本积累过程被打断。规模化生产需要持续的投入，而机械化更需要高昂的初始投资。

但在粮价暴涨暴跌的环境下，小生产者的微薄盈余往往在灾年为了买粮保命而被消耗殆尽，根本无法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借贷市场也因为物价不稳而演变成了高利贷，进一步扼杀了实体投资的意愿。一个严肃的经营者不敢冒险购入昂贵的机器，因为他无法预知何时能收回成本；而一个鲁莽的投机者则很快会被市场的波动淘汰。

再者，分工受制于市场的稳定性。亚当·斯密曾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但在这里，“范围”不仅仅指空间上的地理大小，更指时间上的连续性。一个动荡不安、时有时无的市场，养不活专业的工人和复杂的工序。当大家都不敢脱离土地专职做工时，高效率的工场流水线作业就无从谈起。

因此，在高风险的生存试炼中，人们只能选择最保守的策略：家庭作坊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精。为了对抗风险，只能通过极限增加劳动时间来换取微薄的生存资料，这就是“勤劳革命”却无法引发“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

3. 人口压力加剧的双重机制

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还通过双重机制推动了人口增长，加剧了人地矛盾。

第一个机制是“人口锁定”。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使人们不敢完全离开农业。一旦离开土地，就必须通过市场购买粮食维生。当粮食价格相对稳定时，这是可行的；但当价格暴涨时，挣来的钱可能买不起、买不足粮食，从而生计困难，甚至无法维生。因此，理性的人不敢承受这种风险，大量人口被“锁定”在土地上。

第二个机制是“鼓励多生”。即使通过农业种植维生，也会因为粮食生产不稳定而遇到生存危机，引发社会冲突。在高冲突的社会里，通过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成为优选策略——既能互相救济，也可以团结御敌。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多就意味着力量大、生存机会高，这就引发了对早生多生孩子、人口增殖的追求。“多子多福”不是凭空的文化偏好，而是高风险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两个机制叠加，造成了大量人口困在有限土地上的极端困境。耕地面积有限，人口不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人均产出降低，更容易遇到粮食短缺，形成人地比与粮食风险互相推高的恶性循环。相比之下，英格兰和美国北方各州，由于粮食生产稳定，粮食价格相对平稳，人们可以安全地离开农业进入工商业，社会冲突水平低不需要依赖大家族，生育率自然较低。结果是，相对于耕地面积，总人口不高，人地矛盾不突出，这大大提高了社会稳定性，也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4. 技术适应环境：大纺车的失传

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粮价普遍不够稳定，小生产成为工业革命的障碍是普遍现象。然而，某

些时候、某个地方也可能有短暂的风险降低，从而催生出先进机械，比如元代中国就曾制造和使用复杂度和效率已经非常高的水转大纺车，它拥有 32 枚锭子，通过巨大的水轮驱动，机械构造复杂，加捻效率惊人。但随着明代以后棉花在中国的普及，以及人口压力加剧导致劳动力变得极度廉价，这种适合处理长纤维（麻）且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得无利可图。大纺车虽然先进，但缺少需求使得技术迭代链条断裂，导致它并没有演进出适合于棉花（短纤维）纺织的新版本。大纺车的遭遇代表了那些曾经领先世界的先进机械，它们最终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没有稳定的环境和随之而来的持续需求，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演化为工业革命。只有在英格兰，粮食生产的风险才降到了最低，粮价足够稳定，并且这种低风险状态非常稳固、长期持续。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人口密集、煤铁水力资源并不比英国更为缺乏的欧亚大陆上。

如果按照自由放任的市场逻辑，在中国这样的高风险条件下，很难自发形成支撑工业化的“有效市场”。面对这道困死无数文明的难题，单纯的“模仿西方”是无效的。必须有人像大禹一样，站出来修水库、挖运河、改造物理世界。

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通过“有为政府”的主动作为，投资于农业进步和能源进步，系统性地降低市场风险，人为地创造出“有效市场”的条件。

八、伟大的奠基：为神州大地装上“减震器”

在理解前三十年的意义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革命究竟为了什么？

革命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选择，更是生存秩序的重建。从清末到民国，传统农业体系走向崩溃，西方冲击又破坏了固有秩序，饥荒频发、流民遍地、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社会秩序混乱到了极限。在这种“天下大乱”的高风险环境下，市场机制处于瘫痪状态——产权难以界定，交易成本趋向无限大。

革命的成功，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重建了一个能够维系生存秩序的强大组织。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先打赢一场针对落后农业这一“失序根源”的翻身仗。只有用稳产高产彻底克服悬在头顶的粮食风险，现代化的底座才能铸牢。这是一场现代版的“大禹治水”，是再造中华的不世伟业。

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不是一段“违背比较优势的弯路”，而是一个系统性地降低市场风险、创造“有效市场”前提条件的奠基过程。

1. 计划体制：市场风险的“防波堤”

建国之初，中国在实质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长期战乱之后，粮食生产虽有恢复，但受制于传统农业条件，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 300 公斤上下，且极不稳定。如此脆弱的剩余，根本无法通过自由市场中的交换来支撑庞大的非农业人口，根本无法支持全面的工业化。当时既有的所谓现代化成果，不过是无根的舶来之物。

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下，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征程。

经常有人以“短缺经济”来批评计划体制，短缺固然存在，但是这种批评倒置了因果：**不是计划体制导致了短缺，而是短缺导致了必须实行计划体制。**

我们不应忘记，在计划体制建立之前，中国何曾有过不短缺的时候？那时的短缺，是经常性的饥荒，是毛泽东所痛陈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然而，要进行经济建设，首先面临的是经济规律的硬约束：粮食剩余是货币价值的物理锚点，货币的信用并非建立在黄金或外汇之上，而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工资品”（Wage Goods）——主要是粮食——的充裕程度之上。正如陈云所言：“钞票发多少，要看物资有多少，主要是粮食和棉布。”在粮食产出波动剧烈的环境下，自由市场只会导致粮价飞涨、投机盛行和秩序崩溃。计划体制的实质，是在大市场无法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国家以有限的粮食剩余为货币锚，创造一个隔绝风险的“小市场”。在这个由国家信誉担保的体系内，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科研部门得以在与外部动荡隔绝的环境中，进行长周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迭代。

计划体制虽然在微观层面上缺乏灵活性；但相比于当时处于内卷状态的外部世界，它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点燃了工业化的火种，维系了最初的社会化大生产。

2. 改造物理世界：现代版的大禹治水

在前三十年，中国完成了一场针对物理世界的深度改造，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对抗生存威胁。

* 基础建设的系统推进

五十年代初，以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为核心，中国初步构建了涵盖冶金、能源、化工、机械与军工的完整工业体系。与此同时，基础设施与资源勘探也取得突破：成昆铁路穿越禁区，大庆油田打破“贫油”论断。加上六十年代在原子武器上的突破，既保障了和平发展，也降低了国防费用。这些在当时看来也许“不经济”的投资，实际上是在为整个国家的全面工业化构建骨架，铺设血管。

* 农业革命的隐秘战场

最为关键却常被忽视的，是农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在季风气候下，要实现稳产高产，必须进行“反自然”的改造。通过推广“水、肥、药、种”四大要素，中国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农业革命：

* **水利：**新中国一成立，就展开了战天斗地的治水斗争。从治理淮河到根治海河，从红旗渠到数不清的小水库。到七十年代末，全国建成了**8万多座水库**（占今天总数的90%以上），数百万公里灌溉渠道纵横交错。这些水库不仅是蓄水的容器，更是**平抑粮价波动的宏观调控器**——旱能灌，涝能排，系统性地降低了气候对农业的冲击。

* **化肥：**五十年代末起步，七十年代通过“四三计划”引进13套大型化肥装置，中国化肥工业从无到有。**1980年化肥施用量约1270万吨**，到**1990年已超过2500万吨**。化肥的普及，意味着中国农业突破了自然束缚：正是以大庆为代表的石油天然气工业，提供了关键原料，支撑起现代化工体系，将深埋地下的油气资源转化为土地急需的氮素。工业的成就，化作了滋养农业的养分，这对粮食高产意义重大。

* **农药：**从五十年代起步，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农药工业体系。农药的普及有效遏制了病虫害的肆虐，据估计可挽回15%-30%的粮食损失。这不仅意味着总产量的提升，更对稳产贡献显著。

* **良种：**良种培育在七十年代迎来突破：**1973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抗病高产的小麦品种也相继问世。良种增强了作物对抗病虫害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使粮食更加高产稳产。

这场农业革命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前三十年，伴随着人口几乎翻倍（从5.4亿到近10亿），人均粮食产量长期稳定在300公斤上下——在人口爆炸的同时维持人均产量不降，这本身就是巨大成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型化肥装置集中投产，高产良种全面推广，粮食稳产与高产两翼齐飞，人均粮食不再徘徊，而是节节攀升。

3. 奠基的意义：通往“有效市场”的桥梁

当粮食供应趋于稳定、充裕，一系列连锁反应随之发生：

* **价格可预期：**粮食剩余构成坚实的货币锚，使得劳动、商品和资产价格可预期。政府征税和企业投资有了清晰的依据。

* **劳动力解锁：**摆脱了“从手到口”的生存束缚，数亿农民得以离开土地进入工厂。

前三十年不是弯路。它是“**有为政府创造有效市场**”的决定性开端，以乡镇企业爆发为先导的全面工业化由此开启。

正如大厦不能建在沙滩上，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安全底座，后四十年的“市场经济”大厦根本无从建起。

九、创造大市场：从物理奠基到分工爆发

当基础条件具备后，后四十年的全面工业化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这不仅是市场的胜利，更是建设的胜利。这是一个关于发展的伟大故事，但它的序章写在前三十年。

1. 锁链的断裂与分工的爆发

前三十年的艰苦建设，终于在八十年代初汇聚成一股打破历史枷锁的力量。

首先是粮食风险的解除。 当化肥和良种普及，农业稳产高产成为常态，那条困锁中国数千年的“内卷锁链”终于断裂。随着粮食安全底线的筑牢，国家终于有底气逐步松开严控人口流动的缰绳。农民得以从土地的束缚中被释放出来，而城市也终于拥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去供养那数亿脱离土地的产业大军。这是中国劳动力从“被锁定状态”向“自由流动状态”的关键一跃。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积累。 持续积累的铁路、公路网络支撑了大规模物流，特别是覆盖全国的坚强电网，提供了远超一般国家的能源稳定性。这种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和无时不在的电力供应，是‘有效市场’能够持续运转的物理前提，极大地降低了工业化成本。这种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使得原本分散的区域市场向被统一的大市场持续整合。在这个大市场中，专业化分工不再受限于地理半径。

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分工爆发了：数亿农民工走进工厂，不再像祖辈那样困守土地兼营百业，而是专职从事某一种生产活动。纺织厂数千人、电子厂数万人、汽车厂的流水线，每个工人专门从事特定工序，熟能生巧，效率大幅提高。亚当·斯密在针厂里设想的效率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千万倍地复制。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根本原因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实现了深度分工——这才是效率的真正来源。当众多南方国家还困守低分工状态时，中国已经在各种产业集群中实现了数亿劳动力的专业化协作。这种分工的深化，才是竞争力的根本来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未停步于传统工业化，而是在工业能力的基础上，率先向新能源革命进军。核能、光伏、风电、储能技术、电动汽车——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突破，正在为下一个发展阶段开创道路。尤其是光伏和动力电池，中国已占据全球产能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不是偶然，而是深厚工业底蕴在新赛道上的自然延伸。

2. 深化林毅夫理论：有为政府创造有效市场

针对中国道路的解释，林毅夫提出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对平行概念——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引导，市场配置资源，两者结合就能成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观察，但是还有深入解释的余地。

“有效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不是只要私有化、市场化、价格放开就会自动出现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效市场”需要特定的前提条件：低市场风险、产权价格确定、交易费用低。而这些前提条件都建立在粮食供应稳定、能源供应稳定的物质基础之上。

中国道路的真正逻辑是：“有为政府”创造“有效市场”。

同样是林毅夫等人的观点，认为前三十年走了“弯路”：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违背比较优势，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造成了资源错配和轻工业短板，成为必须正视的历史教训。

但如果我们跳出单纯的“产业效率”视角，从“生存风险”的维度来看，就会发现前三十年的另一重意义。

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时中国要“违背比较优势”去搞重工业？除了国防需求外，一个被经济学家常常忽略的原因是：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当时还是一个被锁死的伪命题。

在粮食剩余匮乏且不稳定的高风险年代，庞大的劳动力被锁定在土地上以求糊口，根本无法转化为产业大军。要解锁这庞大的劳动力，农业就必须稳产高产；而农业要稳产高产，就必须用重工业产品“改造”物理世界：

如果没有钢铁和水泥工业，就无法修建数万座水库和配套的灌溉渠道；
如果没有机械制造业，就无法生产合成氨所需的高压设备，化肥工业就无从谈起；
如果没有化学工业，农药就无法普及；
如果没有电力工业和电机制造，覆盖农村的电力排灌网就无法建成。正是这张网，守住了粮食的底线。

前三十年看似“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实则是基于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它为落后农业注入工业化的硬核力量，通过物理环境的改造，解决了粮食危机，从而稳定价格体系，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有效市场”才得以形成，“比较优势”才会出现。

这就是中国道路的根本所在：不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二元共治，而是“有为政府”创造“有效市场”——先通过重点投资改造物理世界，降低市场风险，然后市场机制才能有效运转。

十、国家治理的物种起源：工程师思维与律师思维

中美治理的差异，常被概括为“工程师治国”与“律师治国”的区别，但这不仅仅是行为方式的不同，更是各自生存逻辑在政治层面的投射：变革与保守的分野。

1. 两种政治伦理：程序至上 vs 结果交付

西方的治理逻辑，直接源于英格兰的历史经验。在英格兰这个温室花园里，粮食生产稳定，外部压力极小。政府没有迫切的需要去对抗自然危机，也没有迫切的外部威胁需要去解决，维护社会内部既定的权利边界就是最稳妥的生存之道。因此，西方发展出了“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的政治伦理。这种传统的核心是“保守”：除非迫不得已，在什么都不做（无为）和破坏既定的权利边界（变革）之间，它总是偏爱前者。

比如在英国，传统的治理之道就是英国人自我调侃的所谓“且行且看（muddle through）”，它是低风险环境所允许的一种低成本方案，因为“世间本无事”，哪怕治理效率低下，社会也能依靠惯性运转。举例来说，像垃圾堆一样杂乱无章，却又备受吹捧的英美普通法系，就是这种低效治理的典型象征。

而美国作为当今西方的代表，将这种逻辑推向了极端。美国地理条件优越，工业化时间早、成就大；地缘环境同样优越，周边没有强国威胁，两大洋隔开了旧大陆，历史上亚非拉国家力量微弱，欧洲大陆深陷分裂，美国从未遭遇过足以撼动其根基的外部挑战。这种长期的舒适区生存，掩盖了其治理体系日益陷入“只讲程序、不问结果”的死循环。这种模式最终演变成了过度诉讼化的“律师治国”——精英们沉迷于论辩和博弈，政府被利益集团捕获，偏私、平庸、得过且过，丧失了动员人力物力解决根本问题的能力。这背后的社会根源在于，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未经充分整合的“马赛克帝国”，由彼此差异很大的各种利益团体拼凑而成。在缺乏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马赛克”结构自有其活力，但一旦面临严峻挑战，缺乏统一意志的“部落主义”就会暴露无遗——为了在撕裂中维持共存，“程序”成了最后的共识，而“结果”则被无休止的内部博弈所牺牲。所谓的“否决政治”，本质上是程序正义对行动能力的瘫痪。这是当今美国治理的顽疾，却也是温室花朵们“死于安乐”的特权。

相比之下，中国面临的是“生存试炼”。在洪水与干旱交替袭来，内乱与入侵如影随形的高风险环境下，无可保守，必须变革，工程师思维（解决问题）必须优先于律师思维（界定权利）。因此，“结果交付”在中国是一种必然的政治伦理，它的核心是“变革”：无论身披怎样绚烂夺目的神圣光环，如果水旱不绝、百姓流离，就是治理的失败，“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政府必须像大禹治水一样，对最终的生存结果负责。这种“责任伦理”迫使中国政府不能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仲裁者，而必须成为一个主动的建设者：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变革，以交付生存与发展的实绩。

人才类型的差异也同样体现了中西的这种不同。当今中国领导层中有大量工程师出身的官员，

而美国政治精英则多来自法学院。这并非偶然，大禹治水的传说，正是中国治理模式的象征性起点：这位圣王本人就是一位勤于职守，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水利工程师；此后数千年，都江堰、郑国渠、京杭大运河、黄河治理，直到新中国的水利建设、铁路电网、能源开发，无不延续着这一脉络。

2. 百炼成钢：无限责任政府

不同的政治伦理，塑造了不同的治理形态。

姚洋提出“中性政府”理论，认为中国政府相对超脱利益集团，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贝淡宁和王绍光提出“贤能政治”，认为政治权力应该由有德行、有能力、有经验的人行使；林毅夫强调“有为政府”，主张政府因势利导，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引导。

这些看似不同的理论，本质上都在描述同一个独特的政治物种——“无限责任政府”。与西方充当“消极仲裁者”的“有限责任政府”不同，后者只需对法律程序负责，而中国政府必须对最终的生存结果负责。

这种“无限责任”并非源于某种权力的贪婪，而是源于巨大的生存压力。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着“生存试炼”——高风险的生存和生产环境。这里农业不稳定、市场风险高、社会易失序。这种压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存威胁：饥荒、动荡、崩溃。政府如果不成长为一个精于规划、追求效率的“工程师”去改进生产能力、改善社会秩序，那么它能否持续存在都要面临疑问。

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成为约束政府行为的无形“纪律”。如果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资源分配就会失衡，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如果用人不当、官员无能，政策就会失误，治理就会混乱；如果不积极行动、不投资于长期能力建设，社会就无法应对未来的危机与挑战。其后果轻则动摇统治根基，重则导致政权覆亡。

因此，政府必须具备多重特征：必须“中性”（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必须“贤能”（选拔有能力的人），必须“有为”（主动创造条件），必须着眼长远（投资于当下未必见效但关乎未来的基础能力）。这不是道德选择或文化偏好，而是生存压力的倒逼。

“生于忧患”，试炼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没有摧毁这个古老的文明，反而迫使它在极限压力下完成了治理体系的“百炼成钢”。

那些曾经为了对抗洪水、饥荒而被迫进化出的强大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统筹能力，并没有随着生存红线的解除而失去价值；相反，当中国从“求生存”转向“求发展”时，这套在极限压力下练就的“内功”，立刻转化为了现代化竞争中其他文明难以复制的战略优势。

“那些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 中国政府的“无限责任”，始于生存的无奈，却终将成全发展的自由；它是应对危机的坚固盾牌，更是后来居上的强劲引擎。

3. 苏联的悲剧：强政府撞上高门槛

苏联的案例则提供了另一种对比，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作为曾经的同盟者，苏联的政治结构与中国类似，同样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同样试图通过计划体制改造自然，却始终未能成功：苏联地处高纬度，约三分之二国土为永久冻土或季节性冻土，有效农业区有限，生长季短，降水不稳定。受制于这种刚性的气候约束，苏联粮食产量始终大幅波动，1980年代在1.5亿吨至2.1亿吨之间剧烈起伏，多次严重歉收。

结果就是，尽管举国体制让苏联在军工和航天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造得出坦克与卫星，但农业这一“经济底座”却始终摇摇欲坠。由于缺乏充裕稳定的农业剩余作为“货币锚”，苏联无法像中国那样创造出“有效市场”，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农产品长期短缺，叠加工业品缺乏竞争力，迫使苏联形成畸形的外部依赖：出口石油换取外汇，再大量进口粮食。1980年代，其年均进口粮食高达三四千万吨。然而，石油和粮食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都很不稳定，“石油换粮食”就成为苏联财政的阿基里斯之踵：1985-1986年，油价从每桶30美元暴跌至10美元以下，苏联硬通货收入骤减，而粮食进口刚需不减，加之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的持续消耗，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外债高筑。这种长期的财政失血，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全面崩溃。

苏联的悲剧表明：“有为政府”是创造奇迹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定胜天”的前提是尊重科学规律与物理极限，是改造自然的有利时机。中国的幸运在于，虽然面临严峻的季风挑战，但农耕区具备基本的降水和温度条件，通过一场农业革命，粮食生产的稳定性问题最终是可以解决的。苏联则受制于更为刚性的自然约束，受制于当时的各种条件，最终未能跨过“有效市场”的门槛。今天的俄罗斯在各种时运变化之下，农业状况已经极大改善——只是对于苏联来说，这场农业革命来得太晚了。

十一、 打破迷思：文明不必冲突

中国道路不仅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借鉴，也正在深刻重塑世界格局本身。

冷战结束后，面对意识形态对抗消失后的世界，塞缪尔·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悲观地预言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将导致不可调和的对抗。

然而，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一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1994年就预言：“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在这个巨变量面前，曾经风靡一时的“冲突论”显得过时了。

这一理论的盲区在于：它试图用文化差异来解释世界，却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原动力——

对生存与发展的永恒追求。

1. 告别生存焦虑：现代国家的和平基石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都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而是工具。古代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蒙古西征，其根源都在于生存压力——对土地、水源、贸易通道的争夺。正是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资源匮乏地区的人们才向外扩张、抢夺资源，以弥补内部生产的不足。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

二战之后，工业化与现代农业革命的结合，使世界主要文明区域的农业剩余及其确定性得到了飞跃。化肥、农药、良种、灌溉——这些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粮食风险，从欧洲到东亚，主要国家都已获得了基于低风险农业的和平秩序。

今天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本质上都是同质化的现代国家。尽管每个文明都保留了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对于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而言，社会秩序的基石不再是宗教或宗法，而是稳定的粮食生产、发达的工业体系和高水平的分工协作。亨廷顿式的文明分类掩盖了这些国家之间本质上的同质性——建立在和平秩序之上的现代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不存在分歧与冲突。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依然动荡，但这并非源于文明冲突，而是发展的不平衡：粮食风险尚未完全释放，社会秩序转型尚未完成。

此外，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也给许多资源型国家带来了持续的不稳定。**但能源风险与粮食风险有着本质区别。** 粮食风险带来的是生存危机，能源风险带来的只是发展危机。随着粮食安全防线的筑牢，人类不再面临大规模饥荒导致的生存威胁，这使得今天大国之间分歧与对抗的烈度，远远无法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

因此，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走向冲突的斗争压力。如果要在历史中为中美竞争寻找先例，唯一可资对比的，不是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也不是英德在一战前的对抗，而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和平落幕的权力转移**——那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在两个真正“现代”的国家之间的竞争。

2. 告别殖民掠夺：中国崛起的独特性

进一步地说，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不同，中国的崛起也没有伴随着殖民掠夺的冲动。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

历史上，中国很早就形成稳定的核心区。秦汉以降，农耕区基本确定；统治北方游牧地带、

西部高寒山地或南方丛林，往往得不偿失，难以产生足够的剩余来支付统治成本。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而言，核心任务始终是内部治理——应对季风带来的旱涝灾害，维系广袤国土的和平。

由此中国发展出了“朝贡体系”，它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小成本维系周边秩序的安排：通过丰厚的回赐和贸易特权，换取周边国家对中心地位的承认，双方各取所需，共享和平。这与西方殖民体系以武力征服、经济掠夺为核心的逻辑截然不同。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是丝绸和瓷器，而非枪炮和殖民据点——这绝非偶然，而是中华文明内在逻辑的体现。

现实中，殖民掠夺不仅在道德上破产，在战略上也极其短视：它只会将南方国家推向对手。更重要的是，中国有能力选择另一条道路：帮助南方国家从中国经验中获益，通过建设和贸易，在与繁荣起来的南方世界的平等往来中共同获益。当中国可以通过平等往来获得比殖民掠夺更高且更安全的收益时，殖民掠夺就失去了理性的基础。

历史遗产与现实环境，共同决定了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的独特性质。“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种新型关系的体现。与冷战时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同，它不以建立势力范围为目的，而是着眼于互联互通。当中国帮助非洲修铁路、帮东南亚建工厂、帮中亚搞能源时，这些投资不仅帮助当地跨越了发展门槛，也为中国自身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不是利他主义的慈善，而是**互利共赢的理性选择**。

十二、 领袖之道：走出宿命的建设者联盟

回顾这个完整的人类发展故事，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谁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

真正的领袖，不能只懂得在风平浪静的温室中种花养草，更必须懂得如何在狂风暴雨的试炼中绝地求生。

1. 南方国家的真实困境

必须明确指出，大多数南方国家发展不良，不是因为压力小、生活容易，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的困难往往超过中国，而且大到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能力。

西亚北非：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地处副热带高压带，降雨稀少且蒸发强烈，农业天然受限于极度缺水。在人口激增的现代，根本矛盾更演变为水资源总量的绝对匮乏，这已不是单纯修建水库就能解决的问题。

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着多重地理诅咒。热带病虫害严重削弱了劳动力，而雨林淋溶作用与草原干旱气候妨碍了农业发展，加之缺乏天然良港，使得内陆运输成本极高。

印度：作为南方国家的典型，印度面临的自然条件比中国更为恶劣。其降雨极度依赖季风，而季风的到来时间、强度和持续时间都高度不确定。这种剧烈的年际变化，加上高温高湿导致的病虫害，使得印度的农业产出极不稳定。

2. 印度的困局：难以跨越的生存试炼

印度不仅面临着比中国更严峻的自然挑战，还面临着更深层的国家能力困境。

恶劣的农业条件从传统上制约了印度的国家能力建设。农业灾害频发、产量剧烈波动，意味着可供征收的剩余少且不稳定，财税基础天然薄弱。财税不足，就无法支撑庞大的常备官僚系统和军队。与中国两千年大一统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几千年历史上统一时期极为短暂（如孔雀王朝的统一只有几十年、莫卧儿帝国也只有约一百五十年），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

因此，印度历史上就缺乏“有为政府”的传统。更进一步，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物质基础——农业条件和历史积淀的双重制约削弱了国家能力建设，表现为印度没有产生能够领导彻底革命的强大组织。结果就是，印度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虽然赢得了民族独立，但旧的种姓制度、宗教势力都被保留下来；而移植而来的“西方式民主”，在缺乏整合的社会土壤上，异化为短期主义的政治博弈，加剧了基于种姓和宗教的社会撕裂。

印度的困境是双重的：面对比中国更大的自然挑战，既缺乏历史积淀的国家能力遗产，又未能通过革命创造新的国家能力。这使得它深陷困境而发展缓慢。

3. 西方的傲慢与中国的共情

相比深陷“生存试炼”的南方国家，西方国家习惯了撒下种子就有收获的幸运，便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阳光（宪政民主）和雨露（市场经济），鲜花就会自动盛开。它们难以共情那种基于恶劣自然的生存绝境，因为这种苦难从未出现在它们的历史记忆中。

因此，面对南方国家的困境，西方只有以己度人的傲慢说教：指责它们“不够民主”、“政府管得太多”、“市场不开放”，甚至在危机时刻落井下石。这种态度，不仅是“何不食肉糜”式的无知，更是利用他人生存危机进行残酷收割的伪善。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赢得南方国家的广泛信任，正是由于中国通过自身的浴火重生，掌握了破解人类生存困境的密码。中国证明了：即使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人类依然可以通过“有为政府”组织基本建设，通过系统性投入主动改造环境，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西方无法复制的特质——深层的理解与共情：

- **不搞虚伪的说教：**不强推意识形态，不附带政治条件。
- **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一带一路’不仅输出基建能力，更涵盖了农业与新能源技术援助。从解决粮食危机的杂交水稻，到解决能源短缺的光伏风电，中国致力于帮助南方国家夯实生存底座，跨越‘生存试炼’。
- **平等与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深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艰难，因此愿意以平等之心尊重南方国家。

这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互利共赢。中国帮助南方国家，不是为了建立某种依附体系，而是因为中国清楚地知道：只有让更多的国家走出生存试炼，建立和平秩序，创造有效市场，世界和平才能稳固，世界市场才会真正扩大，人类文明才能真正走出匮乏的泥沼，实现共同繁荣。

十三、伟大的博弈：霸权的消解与秩序的重生

审视当下的中美博弈，我们必须跳出简单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不过是两个在旧体系内争夺位置的国家的旧故事。中国所代表的力量，并非要在这个旧体系中替代美国成为新的霸主，而是要从根本上消解这种基于等级和暴力的霸权秩序。

1. 离岸制衡：鲜血供养的“自由”

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盎格鲁-撒克逊霸权的延续并非偶然，其核心秘诀在于一套延续了数百年的战略：“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

这种策略的本质，是利用岛国（英国）或洲岛（美国）的地缘隔离优势，坐视甚至挑动大陆强国之间的分裂与对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安全，始终建立在大陆的分裂之上：从组织反法同盟围剿拿破仑，到介入两次世界大战，再到今天的俄乌战争，这一逻辑从未改变。

这套策略之所以长期成功，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欧洲大陆上长期的分裂与对抗；二是英美作为先发国家拥有的压倒性国力优势，使它们在列国对抗中拥有了一举定乾坤的分量。**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赤裸裸地宣称：“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哈里·杜鲁门在苏德战争爆发时也曾冷酷地建议：“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赢了，就应当帮助俄国；如果俄国赢了，就应当帮助德国，那样就可以让他们尽可能地互相杀戮。”这些名言揭示了霸权的冷酷真相：**离岸者的“裁判权”，是建立于在岸者的互相残杀之上的。**

因此，英美霸权下的所谓“自由秩序”，代价极其昂贵——它意味着旧大陆必须长期处于流血和动荡之中。一战和二战，不过是这种离岸制衡策略玩火自焚的终极表现：英国为了阻止

欧洲大陆的自然整合，不惜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为了策动大陆强权互相消耗，结果养出了失控的纳粹德国，最终反噬自身。

美国绝非这一逻辑的无辜旁观者。即便在早期的“孤立主义”时期，美国实际上也在执行一种更精明的离岸制衡：在一战中坐视欧陆互搏，直到各方精疲力竭才下场收割；战后又通过华尔街资本扶植德国以制衡英法。这种策略在二战后被全面继承并推向全球，无论是在中东策动两伊战争让地区强权互相毁灭，还是在欧洲操弄俄乌战争继续制造地缘断裂带，本质都是为了防止欧亚大陆出现统一的力量。

此外，霸权的持续还依赖于一个沉默的背景：亚非拉广大南方国家的极度贫弱。因为缺乏工业能力和资本，它们没有能力对不平等的霸权秩序提出挑战，只能作为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被动接受安排。

2. 告别霍布斯丛林：走出恐惧的囚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霸权争夺被视为国际体系内的必然现象。

在一个发展严重不均衡、力量对比起伏不定、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里，各个国家必然互相猜忌，缺乏安全感。如果不成为霸权，就随时可能被欺压，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言：“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下，理性的国家策略必然是争霸。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所断言的：“大国就是要做街上最横行霸道的那个恶棍。”

然而，中国的崛起正在打破这重囚笼。

这首先是因为力量对比的根本性逆转。与历史上破碎的欧洲或中东不同，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年大一统传统的超大规模单一政治实体，内部高度整合，没有地缘裂痕可供离岸操弄；而从外部看，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实力去充当美国制衡中国的‘代理人’。

这种内无裂痕、外无强敌的格局，使得美国面临着严重的战略成本倒置——它失去了“四两拨千斤”的从容，陷入“千斤拨四两”的窘迫。当天平的一端站着一个巨人，而另一端找不到足够重的砝码时，古老的离岸平衡术就彻底失效了。

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足够的战略空间，无需被迫卷入霸权争夺的零和博弈。

更重要的是，工业与科技力量的进步，特别是新能源革命的突破，正在从物理底层瓦解海上霸权的根基。

核能、光伏、风电、储能、电动汽车——中国在这些决定未来的关键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这标志着能源获取逻辑的根本转变：从依赖地理禀赋的“开采模式”（家里有矿），转变为依赖工业能力的“制造模式”（技术创新）。

无论是光伏、风电的设备制造，还是先进核能技术的突破——将铀资源利用率提升数十倍并“变废为宝”，或者利用储量更为丰富的钍资源，乃至未来视海水为燃料库的核聚变——本质上都是将能源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只要掌握了这些技术，每一寸荒原甚至海水都能成为能量来源。

这一变革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一直以来，化石能源分布不均且依赖海运，使得控制马六甲、霍尔木兹等“咽喉要道”成了海上霸权的致命武器。然而，当能源从争夺性的“地理资源”转变为普及性的“制造技术”，旨在封锁航道的霸权逻辑，终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这一变革不仅为中国解开了能源安全的紧箍咒，更为人类社会铲除战争土壤带来了曙光：当能源不再是零和博弈的标的，国际关系就具备了从“霍布斯丛林”转向“互惠秩序”的物质基础。

3. 建设新世界，消解旧世界

基于这种物理逻辑的剧变，中国并不需要与美国争夺霸权。

面对霸权国的围堵与焦虑，中国的心态恰如《庄子》中的寓言：当鴟鸟死守着嘴里的“腐鼠”（霸权私利），对着飞越高空的鹓鶵（志在维新的建设者）发出恐吓的怒吼时，它根本无法理解对方的志向早已不在这一方腐臭的天地之间。

争夺霸权，就意味着去抢那只“腐鼠”，意味着承认旧秩序的合理性，意味着继续在霍布斯的丛林中厮杀；中国不屑于此，而是志在消解霸权：通过建设互惠秩序的花园，让霸权赖以生存的土壤自行瓦解。**这不仅是道义的选择，更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

其实，霸权的成本极高。正是因为和平与繁荣的缺位，才使得霸权成为可能。而作为霸权者，为了维持这个等级森严的秩序，必须维持庞大的驻军和干涉体系，介入无休止的地区冲突。为了弥补这些高昂的霸权开支，霸权者就必然要压迫和掠夺那些本来就缺少和平与繁荣的国家。这种“收保护费”的模式，虽然在一时一地可以获得收益，但却会带来长远的战略损害和无法洗刷的道义污点。这种饮鸩止渴的循环，正是霸权走向自我毁灭的根源。

承接霸权意味着背负旧世界的沉重包袱，相比之下，**消解霸权则是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意味着轻装上阵，以最小的战略成本，换取最大的发展空间。凭借急速增长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中国有能力做出这一新选择。

扶持南方国家，这是对霸权的釜底抽薪。 中国通过输出建设能力，帮助亚非拉国家实现工业化。一个经济富裕和国力增长的全球南方，将自动脱离霸权体系的控制，从根本上瓦解等级秩序。

交往发达国家，这是对霸权的分化瓦解。 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制造能力构成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霸权国为了自救而发起的无差别收割，正迫使盟友离心离德。这种“利益引力”与

“收割恐惧”的合力，正在从内部瓦解霸权的联盟体系。

面对霸权本身，中国奉行“上兵伐谋”。从实力地位出发，中国选择“鱼与熊掌”兼得：以武力震慑霸权，保护自由贸易；以互利消解对抗，拒绝武力压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不仅是让中国获得尊荣的坦途，更是让旧霸主回归正常国家的救赎之路。

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界，将会自动消解一个霸权等级的旧世界。这就是天命所归的终极逻辑。

十四、结语：其命维新

当博弈的尘埃落定，我们终将发现，这不仅是一场权力的转移，更是一次文明的重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出自《诗经》的古老诗句，在今天焕发了全新的含义：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更预示着人类历史正在经历一场从“丛林法则”向“天下为公”的根本转折。

中国的维新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美国神学”的框架内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是基于“大禹治水”的文明基因与“逆天改命”的奋斗精神，走出的一条建设者之路。

这条路的本质，是否定地理环境的宿命论。它证明了：贫穷不是不可改变的，荒原可以被改造为良田。中国没有通过战争去掠夺外部资源，而是向内挖掘，通过艰苦卓绝的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在不利的条件下创造出了发展的可能。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通过组织起来、征服物理世界从而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这正是“变革逻辑”对“保守逻辑”的胜利。

世界的维新

但“其命维新”不只属于中国。

人类文明同样是一个“旧邦”——数千年来，它被锁死在“马尔萨斯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双重宿命之中。因为生存资源有限且不稳，文明交往受困于零和博弈；因为安全感匮乏，霸权与掠夺成为了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这种宿命曾被视为永恒，正如伊斯兰历史学者伊本·赫勒敦在六百年前所断言的：“未来和过去的相似比两滴水的相似程度还要高。”

中国道路的出现，正在打破这重枷锁。

现代农业革命正在解决粮食危机，新能源革命正在解决能源危机，中国引领的建设能力正在向全球扩散。当生存的底座被夯实，当发展的权利被普惠，人类文明第一次有机会走出“资

源匮乏导致的永恒战争”，迈向“以建设替代掠夺”的新纪元。接力棒正在从“论辩者（律师）”手中，传递给“建设者（工程师）”。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再是基于霸权等级的“治人”，而是基于共同发展的“治天”。

维新的真义

人类这个古老的物种，在克服生存焦虑的进程中，正在走出分流的宿命，迈向合流的未来。这同样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维新”——不是回到某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而是开创一个全新的纪元。

《圣经·创世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和人角力，都得胜了。”

中国与逆境角力而胜之，人类与命运角力而胜之——这就是“其命维新”的真义所在。

中国归来，带回的不是霸权的桎梏，而是发展的钥匙。新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工业建设推动农业革命，在动荡的试炼中成功创造了有效市场；今天，这套经由血汗验证的经验，正在帮助全球南方打破宿命。通过推动南方国家的工业化，我们将重建世界市场，进而重塑世界秩序。

这也正是“中国归来”的终极隐喻：恰如五千年前，大禹通过建设平息了洪水的混乱，确立了九州的秩序；今天的中国，也将通过建设去平息霸权与匮乏的混乱，重塑全球的秩序。

大禹归来，天下安澜。百川归海，万邦协和。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